■大局

谁阻碍了我们自主创新?

——从杨慎“议大礼”说开去

◎周兴维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有明一朝,整个四川省就只出过惟一一位状元。《三国演义》开卷那首传诵千古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就出自这位蜀中才子姓杨名慎(号升庵)的杨状元之手。几百年后,成都市新都区建起了杨升庵博物馆。馆里有一辆全国独一无二的东汉陶三轮马车。文博专家们推测,这辆陶三轮马车与失传了的诸葛亮木牛流马相关。流连在这辆马车前,你止不住会感叹“发明不易,人才不易”。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24岁的杨慎高中状元,青云直上有时,可这杨慎自恃才高,偏不肯俯仰随人,这注定了日后的命运多舛。嘉靖三年(1524年),杨慎因不惧厉害妄自“议大礼”而触犯“天条”,饱受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至嘉靖四十年(1561年)客死戍地,终生未获赦免。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类似杨慎这样有志向有抱负的人遭遇排斥、挤压、打击的事例,真可说举不胜举。恩格斯说“愤怒出诗人”。因为有才华的人屡遭打压,所以传统中国经济社会尽管不得进步却诗人辈出,且不说《诗经》中众多的“无名氏”,举凡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辛弃疾、龚自珍、谭嗣同,还有“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哪一个不是才高八斗、文采风流?哪一个又不是坎坷一生、壮志难酬?也许是因为他们过于自负,存在亚当·斯密所谓的“哲学家和道德学家所说的坏毛病”,但无论如何,对何以有才华的人总是被排挤的追问,是探求中国历史之谜的一个关键。同“天妒红颜”一样,“天妒英才”的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即使在史家们认为思想最解放言论最自由的春秋战国时期,也不乏“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经典案例。请看《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沃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读此“寓言”,令人何等心黯?圣人高足尚不得不收起那套“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的“机事”而改行,黔首布衣弯腰弓背又何足道哉?子贡虽终开一代“儒商”之先河,但可悲的是“丈人”的迂腐观念“道”居然会成为吾国传统:朕躬“勤劳本事”,子曰“杀身成仁”,孟云“舍生取义”,尚书“五虐之刑”,董言“天道不变”,程朱“命小节大”……独尊儒术必然万马齐喑,援法入儒肯定指鹿为马。

这一来,你哪里还敢再有想法,哪里还敢再有真话。岂止不敢再有想法不敢再有真话,还要帮着打消想法随声附和假话。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其实早已先定了以言获罪的专制文化、专制制度——“大礼”是不能“议”的!淫威之下,没有了真理没有了道德,还奢谈什么科学技术、自主创新?难怪今日中国的专利、发明和竞争力会如此不尽如人意!“丈人”的观念及行动决定“丈人”的命运,一个民族的观念及行动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一个国家的观念及行动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被迂腐的意识形态观念扭曲了心智、窒息了思想、扼住了咽喉、封堵了口舌的个人、民族和国家,怎么会有想象力、创造力的生长空间呢?又怎能视智慧为最珍贵的财富呢?传统中国的科技、经济、民生之不得进步,迂腐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统无疑是第一大障碍。

传统国人浸淫于迂腐传统意识不自知,而旁观者却清。在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中,中央帝国是“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将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再早些时候,亚当·斯密1776年在经济学开山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就是说,是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的法律制度所能允许的发展程度。”

实事求是地讲,230年来,及至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发达国家格局,其实并无多大改变;撇开石油国家不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有所谓亚洲四小龙勉强挤进了“富人俱乐部”。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静止状态,被誉为“金砖四国”之首,当下的中国经济已然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5世行报告),但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后劲可能会有大问题。无论以人均指标衡量还是以经济的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衡量,中国现今无缘、今后较长时期仍将无缘“富人俱乐部”。总之,建设创新型国家绝非技术性概念或技术性举措,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世界注定有“穷”“富”,所以世界也有政治经济学,有价值判断;但政治经济学并不仅仅是关于阶级经济关系特别是阶级间经济斗争的学问。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相互促进的关系和机制,揭示了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乃至不同国家和睦相处的基本原理,从而给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基本原则:富人(国)的产权和穷人(国)的人权这个“一对一”的“供求平衡”关系(看看《道德情操论》,看看“福利国家论”,不难明乎此理)。简言之,对知识和信仰的尊奉,对信用和厂商的尊敬,对农工和平民的尊重,对法治和自由的尊崇,既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向自主创新和富强之路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繁荣兴盛的一个标志和起点。吾人吾国,做到了吗?做好了吗?

是以此文纪念《国富论》发表230周年。

临江仙
杨慎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金银岛

央行睁大警惕的眼睛

◎倪金节
鲲鹏伟业投资管理公司分析师

虽然10月CPI数据只有1.4%,但央行本周二发布的2006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却再三强调流动性管理和信贷的反弹风险,笔者认为,这表明央行对未来的通货膨胀持着高度警惕,反映了央行对当前货币环境的失常有着些许的忧心忡忡。由此看来,今后一段时间,通过多样化的紧缩工具逐步将货币环境正常化,将是货币政策最大可能的选择。

偏低的利率环境是造成了当前诸多经济问题的最大症结。说起来,中国的货币政策之所以没有与世界主要国家央行自2004年开始同步实施紧缩,将货币环境正常化,以收紧流动性的过剩,其基本考虑还在于人民币的汇率。再加上中国金融市场有效性偏弱,所以目前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要更严重些。8月8日以后美联储连续三次暂时停止加息,维持5.25%的基准利率不变,使得中美利差在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进一步加大的迹象,但货币政策受到汇率政策的掣肘,致使“不可能三角”在中国出现,最终造成的危害与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不相上下。

货币环境不能正常化,将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更加棘手。由于利率偏低,中国目前处于负利率时代,货币环境的超宽松导致信贷和投资难以控制。在2004年以后,美国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已经逐步恢复了正常的货币环境,利率水平大都回到了相对中性的区间。而中国央行的利率政策由于受到汇率政策的掣肘,3年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贷款者和银行双方资金成本都偏低,大量的资金便从银行系统源源不断地流出去,广义货币17%的增长目标只能成为央行的一个梦想,这些资金大量涌入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固定资产投资领域。

央行今年全年新增贷款2.5万亿元的目标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基本完成,显示低利率环境成为了信贷扩张和投资增长的直接根源。自“十一五”规划启动以来,各地基础设施项目大面积上马,拉动了投资的增长,房地产热已经蔓延至全国大、中、小城市。2005年底,中国信贷与GDP之比高达130%以上,这只有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东南亚国家有这样的记录。当货币环境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恢复正常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借助于货币的升值来解决经济的过热,这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以笔者的观察,中国许多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开始失控,一旦地产泡沫破灭,我们的银行系统又将如何承受呢!

始于世纪之初的世界经济上升周期已处在偏后位置。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全球通货紧缩的威胁,再加上9·11事件直接打击,美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世界经济也随之受到牵连。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美国采取了低利率政策和宽松的货币环境,美联储从2001年1月份开始逐步调低联邦基准利率,以每次0.5%的速率在6月份调低到4%,在年底调至2%,达到较低水准。在2002年至2004年的三年时间里,联邦基准利率始终低于2%,并在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间处于1%的历史性低水平。但2004年以后,美联储通过连续17次升息逐步将基准利率拉至相对中性的区间,货币环境接近了正常化。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前段时间也都有相应的紧缩政策。

但随着第二季度美国经济的放缓,货币的紧缩已经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压制信号,因此伯南克顺应经济规律暂时停止了加息。但是基于“美元本位制”的存在,美联储在短期内不可能就此停下脚步,变加息为减息。因此,中国央行现在开始通过缓慢多次的加息逐步将货币环境正常化就显得尤为重要,更是化解流动性的有效良方,也为以后经济不景气时候的减息预留空间。

央行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报告、数据和相关政策,让人很清晰地感觉到央行的新思维:货币政策虽然不能根本性地解决这些问题,行政手段更加立竿见影,但是货币环境的失常却是造成诸多怪异问题的源头。

据此可以推测,央行今后一段时间继续执行偏紧货币政策的概率最大。

■排沙简金

盛田昭夫坚拒贴牌

◎王育琨
首钢发展研究院企业所所长
管理专家

中国为什么至今仍缺乏世界级的企业家与世界级的品牌?这个不断撞击中国人敏感神经的问题,现在也成了欧美主流媒体的常新话题。在诸般议论中,中国的贴牌生产业态,常被诟病。

贴牌生产,实际上是一种被动卷入全球化的方式。当今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了这个程度,就是所有企业都要在全球内整合资源搭建自己的供应链。在这个背景下,要么高擎品牌和技术主动去组合资源,要么有口饭吃就行被动参与全球化。被动参与全球化的贴牌生产,使得中国代工(OEM)公司被牢牢固定在利润最微薄价值链的最底层。

罗技鼠标是最好的范本。这是瑞士与美国合资的一家鼠标制造商,生产工厂设在苏州。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鼠标。罗技鼠标贡献了一个恒等式“40=8+15+14=3”,有助于说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罗技鼠标在美国的售价约为40美元,罗技凭借品牌拿走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海外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包括工资、电力、交通、税收和其他经常开支。公司的利润只有从这3美元中挤压。而电力、交通、税收是刚性的,代工公司都把利润的增减砝码全都压在了员工报酬的增减上。

没有哪一个企业家不想多赚钱。贴牌生产往往被当成后发国家不得不走的阶段。而那些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从不屑于贴牌生产的业态。索尼和盛田昭夫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

盛田昭夫的全球化经营思维,起始于他1953年的一次北美、欧洲旅行。战后盛田昭夫第一次去美国,感觉是不知所措。穿梭的轿车、宽阔的道路、遥远的距离以及直冲云天的建筑,高速发达的美国经济使他感到窒息。盛田满腹疑虑:一个小小的日本公司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里是否有生存的机会?而当时日本制造的概念,基本上是与小饰品及廉价仿制品联系在一起,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产生的懊恼。当后来到了荷兰参观菲利普公司,他惊奇地发现这个闻名世界的大企业集团总部,竟然设在古镇艾恩德霍枫,这里的规模和生活节奏使他觉得容易对付,心情也舒畅起来。他给井深写信:“如果菲利普能做到,也许我们也能做到。”菲利普启发了他:公司地点不重要,建立一个国际知名品牌至关重要。

1955索尼在美国起步时茫然无措,找不到经销商。盛田昭夫放下所有的事情,跑去美国一家一家经销商接洽谈判。终于有了一个对半导体收音机感兴趣的,并且下了10万台定单,条件却是要以经销商布罗瓦的名义销售,亦即索尼为这家美国公司做代工,理由是“没人听说过索尼”。10万台可是一笔大订单哪,价值超过了索尼当时的总流动资本!那是索尼非常饥饿的年代,日本董事会的一致意见是接受这笔订单。技术迷井深都饿怕了,禁不住这个巨大的诱惑,几次给盛田打电话,强调应该接受布罗瓦的条件。而对盛田来说,要紧的是让索尼的名字响彻全世界,公司在美国市场上尚未立足,此时的妥协将会招致索尼最终的失败。但是,盛田无法说服在日本的井深和董事会,于是他决定行使自己的权力:拒绝这份订单。他甚至威胁说,董事会再行相逼,他就辞去董事职务。若干年后,盛田说:“拒绝10万台的订单是他在职业生涯中所做的最好的商业决策”。

最深刻的敌人,不是你的竞争对手,而是你自己的眼前利益。如果当时盛田昭夫选择了代工,可能后来我们就见不到索尼品牌了。因为习惯是一种最强大的力量,它会有一种惯性,驱使一个企业和一个企业家往明知错误的方向走。要是我们的企业家遇到盛田昭夫这样的机会,会怎么样呢?恐怕大多数会选择接受订单,哪怕是做代工。这种思维和意识的差异,正是平庸与强者的分界线。

中国企业家缺乏的正是强者的思维和意识。

■世话实说

大师杯再增上海底气

◎程　实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博士

2006年上海网球大师杯来了。

绝代球王费德勒、少年侠客纳达尔、邻家男孩罗迪克、哈佛才俊布雷克、光头劳模达维登科、草原雄鹰纳尔班迪安……光是这一长串星光四射的名字就足以让网球粉丝兴奋得窒息。

可以想象,在摩拳擦掌的球员眼里,上海网球大师杯是高手云集的华山论剑;在翘首以盼的球迷眼里,大师杯是一道色香俱全的饕餮大餐;在精打细算的商家眼里,大师杯是一个商机四伏的巨大市场。那么,在经济学门徒的眼中,大师杯会是什么呢?

在经济学门徒的眼中,上海网球大师杯就是一幅文体和经济和谐互动的图画。跳动的网球中,蕴藏着经济发展与文体丰富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正是文体与经济在如此血脉相连的因果递进之中逐步走向共同繁荣,人类社会才能在物质富裕的同时享受精神愉悦的快感。

首先,从经济之于文体的角度看,文体娱乐在不断多样化、现代化、国际化、规模化、明星化的发展道路上,时刻面临着“经济门槛效应”的潜在约束,网球大师杯的诞生是上海经济腾飞的自然产物。经济学中有一个名闻遐迩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自从潘多拉之盒被打开之后,贪婪的人类就有着无穷无尽的复杂需求,这种金字塔型的需求结构从下到上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更重要的是,梯形排列的特征使得需求的满足必须依次递进,一般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需求的满足才会趋于可能。就从小小网球的视角,中国经济和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就可充分窥见,改革开放之前,居民收入水平的低下使得需求结构长期居于满足温饱的低层次,高消费的网球基本上乏人问津;改革开放初期,虽然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显著改善,但经济发展还是处于注重积累的起飞期,网球作为一种贵族运动只是在小圈子内活跃;此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日俱增,网球在全民健身运动大潮之中才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上海和北京作为经济增长强劲、网球氛围浓厚的现代化城市具备了将大型国际网球赛事带入中国的物质基础。

其次,从文体之于经济的角度看,文体活动的国际化发展是提高城市知名度、增强经济“软实力”的有效举措,网球大师杯从2005年起连续三年在上海举办,不仅提升了上海国际性大都市的世界形象,更给上海核心竞争力的增强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大师杯落户上海,将使全世界体育媒体的视线长期聚焦于上海,在拥有了姚明和刘翔这两个无可替代的明星标签之后,跳动的网球和轰鸣的F1同时给上海增添了新的体育光彩。从现代城市发展理论来看,注意力经济、人才经济、创造力经济共同构筑的文化力是城市“软实力”的关键指标,作为比历史悠久的四大满贯赛事更为新鲜、更为豪华、更为诱人的年度网坛巅峰之战,网球大师杯在增强上海文化底蕴的同时,也为上海经济知名度、软实力的提升添加了不可小视的砝码。从小小网球的视角,城市营销的现代化操作就可见一斑。科特勒在定义什么是城市营销时指出,运用市场营销的方法论,对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工业、农业等诸要素进行合理的策划与整合,以求找到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增加城市财富及知名度、提高城市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最佳发展道路是着眼于城市发展总体利益的理性措施,而上海大师杯正是在WTO时代城市经济竞争如火如荼之际,通过文体渠道美化上海、宣传上海、营销上海的有益之举。

也许世界还在回味那个热情洋溢的美利坚,那个浪漫满屋的法兰西,那个古韵悠长的英格兰,或者那个温馨宜人的澳大利亚,但华夏神州的激情活力,申城的动感时尚迅速让世界转移了目光。

■彼岸

“热心保守派”走到头了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在本栏上一篇《华尔街预祝府院分权》中,我预测过,今次的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将要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参议院的前景则难以估计。那其实不是我的预测,而是我在引述美国舆论以及政治评论界具有共识的预测。果然,共和党不仅失去了众议院,而且还以一席之差交出了参议院,也同时输掉了包括纽约州、麻省等州的州长选举。

有政治评论家称,民主党将中期选举搞成了对布什以及共和党领导层的一次信任投票。由于腐败在本次选举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我并不完全同意这样的结论,但在一定的程度上,本次中期选举的确与布什本人有极大关系。

布什对于共和党候选人成了一个消极的因素,如果说那就是因为伊拉克战争的局势,实在是过于简单的说法,因为布什在国内政策上也惹怒了不少选民,其中包括许多原本是布什的拥趸,也就是那些坚信小政府保守理念的美国选民。小政府应该是美国最传统的保守理念之一,在美国人当中有广泛的支持。本次中期选举的民意调查显示,60%以上的选民认为当今政府管事太多,共和党领导的国会顺应了布什大政府的理念,为造成美国创记录的财政赤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失去了一些关键的选票。

布什从政本是以保守派的身份出道,但他的保守派理念并非纯正,尤其是从经济理念来讲,布什虽然信奉和推行供应学派的减税经济政策,但却并非遵守保守派的小政府之原则,2000年,共和党竞选班子将布什包装成“热心保守派”(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别小看这“热心”两字,那就是大政府、大开支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在美国的自由与保守理念之争中,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就是,自由派愿意通过大政府为大众办事,比如建立庞大的福利系统,包括全民的公费医疗等,保守派则主张不要政府去包办大众的事情,最极端的包括取消国家教育部门和公立中小学系统,还有大学的学生贷款,福利是越少越好,保守派希望通过创业和就业去帮助穷人。保守派有这么一句名言:“我能努力工作,为什么你就不能。”由于保守派强调个人奋斗,政府尽量少干预,并坚持削减福利,因此有了“冷酷”或没有“同情心”的名声。

布什的“热心的保守派”试图走一条中间路线,似乎要取自由、保守两派的长处,更希望以此取悦两派,赢得中间派。从经济政策来理解,“热心保守派”就是既要减税的供应学派经济政策,又要有大政府才能表达出的“热心”。布什在2000年大选时对选民许诺,如果当选,他要推出一个处方药的福利系统。布什入主白宫后,果然与共和党领导的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医疗福利法案。据专家预算,该方案最终将会花去美国政府几万亿美元,并非当初预计的3000多亿美元。除了处方药的福利方案外,布什在其他诸多方面表达了“热心”,这几年的财政赤字并非是布什政府所解释的来源于对外战争,因为除了军事开支外,其他的开支项目也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我支持保守派的经济思想,但我理解,小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永远执行下去,那是不现实的,自由派的经济理念也有很大的市场,其实应该是一种轮回,也就是说,两派的经济政策在不断地交替执行,却不应该同时存在。布什的“热心的保守派”就是试图两者兼容,在初期,许多经济保守的选民并不知道布什要“热心”到什么程度,到今天,他们警觉布什是“热心”得过了头,认识到布什的“热心保守派”的本质,那已不是“热心”,而是疯狂的大政府开支。

没错,布什的减税政策推动了美国经济,但政府的巨额债务给美国的经济大大打了折扣,那就是布什“热心保守派”最大的失败。2008年大选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再也不会使用“热心保守派”来推销自己了。